

宁波商帮文化教程

庄丹华 ◎ 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宁波商帮文化教程

庄丹华 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波商帮文化教程/庄丹华编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682 - 2566 - 3

I. ①宁… II. ①庄… III. ①商业史—宁波市—教材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426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42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60.00 元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文案编辑 / 刘永兵

责任校对 / 孟祥敬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前 言

宁波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四明山山美水美，千丈岩幽壑飞瀑，松兰山金沙碧海，招宝山雄伟壮观，东钱湖湖光山色，上林湖越窑文明，阿育王寺供释迦牟尼舍利，保国寺大殿成江南奇迹，天一阁藏书楼亚洲第一……宁波人民数千年来在此繁衍生息，越有范蠡文韬武略，可治国安邦可归隐经商；宋有被列宁誉为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治理宁波；王应麟的“三字经”哺育儿童，影响深远；王阳明创立心学，黄宗羲倡导“工商皆本”“经世致用”，创浙东学派……宁波丰富的文化底蕴为宁波商贸业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自然人文条件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使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形成特定的区域文化心理。宁波靠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和跨海而治的行政区划，使当地形成了农业、渔业和商业三种谋生方式共存共荣的经济文化格局。渔业生产需要外向强悍、恣肆汪洋的性格，农业生产要求的是和谐、平稳的实践理性，而商贸活动则强调心智的精明和灵活，于是在宁波这三种文明因素逐步交叉、积淀，构成了宁波独特的传统文化。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交汇，促进商贸文化的发展，培养了崇商意识和开拓理念；港口城市独特的区位优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则造就了当地人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两相结合，为宁波商帮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丰厚的地域文化蕴涵和特定的文化传统成为孕育宁波商帮的丰厚土壤。

所谓商帮，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商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就在这样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商帮应运而生。具体而言，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在明清3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十大商帮，都曾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但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商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对于宁波商帮（有的称之为“宁波帮”），《宁波帮大辞典》的解释是：“近代以来在宁波地区以外的一定区域从事工商活动的宁波籍人士。”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民营企业的不断崛起，他们以母地为中心，在海内外开拓市场，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所以近年来宁波商帮研究者普遍提出应该把这一部分群体也列入宁波商帮的整体范畴，共同作为宁波商帮

文化的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本书对宁波商帮的界定是：宁波商帮是一个商业群体，是指从明清以来以宁波地域为中心的、在外地经商的宁波籍商人及本地的宁波商人群体。就地域而言，宁波籍商人包括现在的宁波市所管辖的海曙、江东、江北、镇海、北仑、鄞州6区，奉化、余姚、慈溪3市，宁海、象山2县，以及旧宁波府所管辖的定海（今舟山市）。这里的“商”，不仅指流通领域的商贸经营者，还包括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宁波商帮是指由宁波籍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所组成的商人群体。

宁波商帮从明末清初开始形成，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而不衰，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商帮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闻名遐迩。百年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在考察了中国沿海地区之后说：“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努力奋斗、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6年在视察宁波时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在1984年就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为动员“宁波帮”人士参与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诚然，从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吴锦堂、虞洽卿、秦润卿，到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曹光彪、李达三、张忠谋、应昌期，等等，都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优秀人物。以他们为代表的宁波商帮，继承了宁波人的精明能干、审时度势、眼界开阔、诚信笃实，他们热爱家乡，报效桑梓，穷能独善其身，达能兼济天下，在近现代商业史乃至通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发展迅猛，又有一大批秉承了宁波商帮精神的商界人士，诸如丁磊、沈国军、张静章、茅理翔、李如成、储吉旺等人在海内外各业界大显身手，书写出新的商界传奇。

宁波深厚的商贸传统也成就了宁波的商业教育。这里的学子与这片土地及其文化积淀有着天然的联系，以当地的文化资源来教育学生，具有其他教育素材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宁波商帮现象的研究与对宁波商帮文化的整理、挖掘，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当下工商业迫切面临转型升级，对宁波商帮现象与宁波商帮精神的研究，有助于打造新一代创业者，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另一方面，弘扬宁波商帮精神，将宁波商帮文化与高校教育有机结合，提升大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也是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而这也同样适合于其他地区的学生和读者。

编写《宁波商帮文化教程》，旨在阐释宁波商帮的内涵，汲取宁波商帮创业的成功经验，弘扬宁波商帮“创业、务实、诚信、协作”的精神，进一步推进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培养更多的新一代创业者，为繁荣区域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宁波商帮文化教程》全书共列九章，深入分析了宁波商帮崛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充分挖掘宁波商帮发展演变的艰辛历程，多角度展示了新旧商帮中涌现出来的典范人物及其主要人生经历和商帮知名家族演进的历程，精心提炼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和人文精神，同时呈现宁波商帮的百年之最和宁波的全国之最，以供学习者和研究者参考。

第一章 宁波商帮崛起的背景	(1)
第一节 地理环境的影响	(2)
第二节 人文环境的影响	(4)
第三节 外来文化的影响	(9)
【链接】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14)
第二章 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	(20)
第一节 宁波商帮的形成	(21)
第二节 宁波商帮的发展	(25)
第三节 宁波商帮的鼎盛	(28)
第四节 宁波商帮在港澳台及海外	(33)
第五节 新时期的宁波商帮	(35)
【链接一】 首届世界“宁波帮”大会宣言	(38)
【链接二】 揭秘百年“宁波帮”	(39)
第三章 宁波商帮的典范人物·传统名商	(42)
第一节 叶澄衷	(42)
第二节 朱葆三	(45)
第三节 吴锦堂	(46)
第四节 宋炜臣	(49)
第五节 虞洽卿	(53)
第六节 秦润卿	(56)
第七节 项松茂	(59)
第八节 沈祝三	(61)
第九节 王宽诚	(65)
第十节 邵逸夫	(69)
第十一节 包玉刚	(75)

2. 宁波商帮文化教程

第十二节	胡嘉烈	(84)
第十三节	李达三	(87)
第十四节	曹光彪	(89)
第十五节	张忠谋	(93)
【链接】	邓小平与“宁波帮”	(96)
第四章	宁波商帮的典范人物·当代甬商	(103)
第一节	张静章	(104)
第二节	茅理翔	(106)
第三节	储吉旺	(109)
第四节	李如成	(113)
第五节	邱智铭	(116)
第六节	郑坚江	(118)
第七节	沈国军	(120)
第八节	丁磊	(123)
【链接】	宁波民营企业家发展现状与群体特征(节选)	(128)
第五章	宁波商帮的家族传承	(137)
第一节	十七房郑氏家族	(137)
第二节	镇海柏墅方氏家族	(139)
第三节	李也亭与李氏家族	(143)
第四节	严信厚与严氏家族	(159)
【链接】	影响全球的十大金融家族	(164)
第六章	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创建品牌	(169)
第一节	周祥生巧塑品牌	(170)
第二节	任士刚与鹅牌商标	(171)
第三节	方太的“厨房专业化”品牌战略	(172)
第四节	奥克斯的品牌发展	(173)
第五节	广博文具的品牌发展	(176)
第六节	贝发电子的品牌国际化之路	(178)
第七节	杉杉“多品牌、国际化”之路	(182)
第八节	雅戈尔与杉杉品牌发展模式的比较	(185)
【链接】	海尔的品牌价值是如何创造的?	(187)
第七章	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成功营销	(190)
第一节	天津“宁波帮”的经营模式	(190)
第二节	黄楚九的营销谋略	(195)
第三节	张敏钰的经营之道	(196)
第四节	奥克斯空调的营销渠道	(201)
第五节	维科家纺的营销渠道	(204)

第六节	雅戈尔服装的营销渠道	(207)
第七节	贝发文具的营销渠道	(210)
【链接】	阿里巴巴的营销策略	(212)
第八章	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经营管理	(215)
第一节	传统甬商的人本管理	(215)
第二节	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	(219)
第三节	虞洽卿的经营理念与经营谋略	(220)
第四节	秦润卿对钱业的改革	(224)
第五节	包玉刚的经营管理思想	(228)
第六节	网易的互联网思维	(233)
第七节	银泰百货的电子商务战略	(235)
【链接】	23年前联想是华为的17倍,23年后 华为是联想的5倍,差距在哪里?	(239)
第九章	宁波商帮的人文精神	(244)
第一节	开拓创新,赢得未来	(244)
第二节	恪守诚信,信誉卓著	(249)
第三节	团结互助,共克时艰	(253)
第四节	扶困济世,造福社会	(255)
【链接】	古今商帮——精神的传承与进取	(260)
附录一	宁波商帮的百年之最	(264)
附录二	宁波的全国之最	(268)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73)

宁波商帮崛起的背景

内容摘要

本章从宁波地域文化的视角分析宁波商帮崛起的背景，揭示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首先，就地理环境来看，宁波背山面海，水域资源丰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小就学会了与水、与大海打交道，这为宁波商人从事航海和海内外贸易奠定了基础。宁波地处中国中部沿海，位于东海之滨，扼南北水路要冲，兼有大陆与海洋两者之优势，可促进国内外贸易的产生与繁荣。其次，就人文环境而言，范蠡的经济思想、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思想观念对宁波商帮影响极大，促进了当地崇商、重商、善商的传统习俗与社会风气。最后，宁波商帮的快速发展，还与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有直接的关联，宁波商人自汉唐以来就渡海经商，外贸频繁，近代更是直接参与洋行的经营管理，经营新兴行业，迅速从旧式封建商人演变为新式工商业资本家，在长期吸纳外来文化精华的过程中，宁波商帮自身得到了有益的补充和壮大。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外来文化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一个商帮的崛起。

学习目标

通过对宁波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外来文化的深入解析，体悟地域文化对人的深刻影响，感受“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内在含义，并学会一种解析的方法。

关键词

宁波商帮；崛起；背景；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外来文化；影响

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宁波作为滨海商城、浙东门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陶瓷之道的起航港之一，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经营有方、深谙商贾之道的宁波商人。宁波的人文地理环境，对本地域人群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有着重要影响。宁波籍著名作家巴人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统治宁波的是三件东西：东门外大街上商店里传出来的算盘声，各个中等学校里传出来的朗诵桐城派古文的读书声，外加半边街上那鱼行里的鱼贩的叫卖声。这三种声音就构成这中古式城市的特色。”这段话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宁波商帮文化的成因，宁波商帮就是在这样绵绵不绝的文脉与商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历时悠久的对外交往史、贸易史也对宁波商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地理环境的影响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正如《中国文化地理概说》一书中所言：“人类文化必然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它必然要打上地理环境因素的烙印。”宁波商帮文化的形成自不例外，宁波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海陆分布情况都对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一、得地理之便，擅长航海

宁波简称“甬”，位于我国海岸线中段，浙江宁绍平原东端，即东经 $120^{\circ}55'$ 至 $122^{\circ}16'$ ，北纬 $28^{\circ}51'$ 至 $30^{\circ}33'$ 。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西接绍兴市的嵊县、新昌、上虞，南临三门湾，并与台州的三门、天台相连。全市总面积 9 365 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为 1 033 平方千米。

宁波境内主要山脉有四明山和天台山两支。四明山又名句余山，是天台山脉的支脉，横跨本市余姚、鄞州、奉化，并与嵊州、新昌、天台三县（市）连接。山峦起伏，蜿蜒连绵，危崖壁立，森林茂密。天台山主干山脉在天台县，宁波境内为其余脉，有四大分支从宁海县西北、西南入境，经象山港延至镇海、鄞州东部诸山。

宁波有漫长的海岸线，港湾众多，岛屿星罗棋布。全市海域总面积为 9 758 平方千米，岸线总长为 1 562 千米，其中大陆岸线为 788 千米，岛屿岸线为 774 千米，占浙江省海岸线的三分之一。全市共有大小岛屿 531 个，面积 524.07 平方千米。宁波境内有两湾一港，即三门湾、杭州湾、象山港。这些港湾，因有钱塘江、甬江及众多溪流注入，夹带着大量泥沙和营养物质，为滩涂和近海生物繁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宁波区位图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早在7 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已在这片土地上营构定居、农耕渔猎，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独木舟残骸、木桨遗存和舟的模拟艺术品陶舟，以及用来制造独木舟的有段石镞。可见，当时的先民很有智慧，已发明将大木头中间挖空、放在水中不会沉下去的木船，又将细木削砍成划船用的楫，开始过水上航行生活。舟楫的发明不仅使河姆渡人得以下海捕鱼，还可以沟通原先为江河阻隔的四邻部落间的联系。1982年，在渤海湾海底发现一件侈口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到，而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来的陶釜类同。这是河姆渡人海路航行到达渤海湾的重要物证。

宁波的地理环境造成当地人多有外出经商谋生的，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小就学会了与水、与大海打交道，这为宁波商人从事航海和海内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先人在制作独木舟

二、地处海滨，经商成风

宁波地处中国中部沿海，位于东海之滨，扼南北水路要冲，兼有大陆与海洋两者之优势。大陆与海洋产生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互补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不同才有互补性，才有贸易产生的可能。海洋区只产鱼类，不产粮食，渔民必须与农民交易，将自己的海产品与陆地上的农产品交换。宁波的海边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宁波最东部的鄞州区原称鄞县，就是因为“海人持货贸易于此”而得名的。据说，当时宁波海岸线在今天阿育王山（贸山）下的同谷，这里是陆人与海人交易最频繁的码头区。因交易频繁，经济日益发达，人口增多，政府在此设立了一个鄞县。鄞，就是贸山边上的城邑。这种交易方式，至少在秦汉时期已经产生，一直延续到整个六朝时期。这种海人与陆人间的贸易，本质上属国内贸易。

秦代以前，宁波商贩已为数不少。贸山一带已是邻近地区农副产品和海产品集散地，有一批商贩聚集在这里持货贸易。秦汉以后，宁波修建堰坝，开垦湖田，乡民衣食充裕。海上航路，北到辽东，南及交趾，贸易地域进一步拓展。唐宋时期，“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元代，出现专门经营福建、广东土产的南货号 and 专门经营东北、山东、河南土产的北货号，有海运船户千余家。明代，宁波的海舶河舟可通关东、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清初，商贾聚集到宁波三江口，滨江商行林立，百货皆备。乾隆年间（1736—1795年），城区有较大店铺七百余家。宁波江夏在唐代就有市场。宋代以后，商船停泊在奉化江畔，客商云集。清嘉庆（1796—1821年）、道光（1821—1851年）

年间，商船海舶停泊在三江口一带，帆樯林立高耸，蔚为壮观，与东门口、半边街、双街、钱行街、糖行街、灵桥门、东渡路共同形成繁华商业区，谚称“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夏”。



三江口商船

这时最值得注意的是“海人”群体的存在。海人就是海边渔民。他们开始可能也是陆地上的老百姓，但是他们敢于下海，敢于在大海中与风浪搏斗，是一群相当勇敢的人。面对大海这个没有行政边际的宽广领域，只要有利，他们就会随“鱼”而动，随利而动。“吾甬人以冒险之天性，斩荆披棘，经营所业，其间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一群普通的农民，而是外向意识相当浓厚的“海民”。明清时期，政府实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迁海活动，第一次是明初洪武时期（1368—1398年），为了对付倭寇；第二次是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年），用以对付台湾郑氏政权。宁波诸岛即今天的舟山群岛上的百姓，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迁移到宁波的鄞县（今鄞州区，全书同）、镇海、慈溪等地的沿海地带居住。他们身在陆地，心在海洋。这批靠海为生的百姓，随时准备下海赚钱。一旦政策允许，海禁解除，他们就会纷纷下海，寻找生存之本。这批海民的先驱行动，自然带动了陆上的宁波人，使他们也加入经商队伍，从而使整个宁波地区的百姓以经商著称于世。作为滨海商城，宁波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经营有方、深谙商贾之道的商人。

宁波人由于生长在海滨，长期从事海外贸易，九死一生的海上生活使他们养成了履险不惊的刚毅性格和冒险创业、不怕险阻的精神。这种海洋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宁波商帮实业家擅抓时机，领先潮流，胆识过人，外出谋生，不避险远。

第二节 人文环境的影响

文化的产生需要特定的地理环境，同时也离不开特定的人文环境，宁波具有自身独特的人文环境，范蠡的经济思想、浙东学派的思想文化都对宁波商帮影响极大。

一、范蠡经济思想的影响

范蠡是春秋后期的越国名臣，他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图强，经过10余年努力，越国终于吞并吴国。范蠡在灭吴后，急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改称鸱夷子皮，又叫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被世人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

致富，成名天下”。根据民间传说，范蠡起码是到过宁波的，这可以东钱湖的陶公山和陶公钓矶为证。据有的学者考证，先秦的经济思想在17世纪和18世纪曾对欧美经济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而范蠡就是创造这些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行船中的范蠡（画像）

范蠡在决心“下海”的时候，曾经喟然而叹：“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也就是说，范蠡打算将政治军事的谋略用于管理经济，结果“居无几何，致产千万”，“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些都表明他的确是个出色的经营管理人才。

据民间传说，范蠡是木杆秤的发明者。开始造秤时，范蠡用的是13颗秤花，取南斗6，北斗7之意，后来发现有人故意短斤缺两欺骗顾客，于是加上福禄寿3星成16颗秤花，这就是16两制的由来。范蠡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失去福气（幸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永不得俸禄（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折损阳寿（短命）！”木杆秤16两制的由来，体现出我国早期的商业伦理道德。

范蠡提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在把握天时变动规律的基础上，范蠡提出并实践了这一生产经营思想，讲求节令，超前预测，捕捉机遇，适应市场，囤积居奇，盈利颇丰。他还提出“务完物，无息币”。“务完物”，即注重商品的质量；“无息币”是注重资金的周转。以上这些经济思想，和我们现在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的确令人赞叹。

同时，范蠡还提出经商的基本原则与禁忌，为后世商人所效仿，如下述“范蠡经商十二则”“范蠡经商十八忌”。

范蠡经商十二则

- 一是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
- 二是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往者众；
- 三是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
- 四是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 五是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
- 六是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行自多；

七是能用人。因材施教，任事有赖；
八是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
九是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
十是能知机。售宁随时，可称名哲；
十一是能倡率。躬行必律，亲感自生；
十二是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范蠡经商十八忌

一是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
二是价格要定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三是费用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
四是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
五是货物要百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货价减；
六是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端生；
七是临事要尽责，切勿妄托，妄托则受害大；
八是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九是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十是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
十一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劣品；
十二是谈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十三是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
十四是用人要公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十五是优劣要细分，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
十六是货物要修正，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十七是期限要约定，切勿马虎，马虎则失信用；
十八是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失良机。

此外，宁波既然有以范蠡命名的地名和景点，那么他的经商故事必然对宁波商帮产生影响。如陶公山附近就出过李达三、忻礼轼等大商人。陶公山一带以姓忻为多，当地传说，这个忻字是人造出来的，意思是心里想着斤两，不做有违诚信之事。“宁波帮”在外出经商的时候，无论经营理念，还是商战谋略，自然都会以范蠡为榜样。如王宽诚回忆初到香港创业时，遵循了陶朱公之言：“无财力足，少有斗智，既兆争时。”而范蠡经商之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但是又三次把千金散尽，“三聚三散”的故事成为后世商人关于聚财和散财的一种朴素的理念，即当你发财之后，不应该光想着自己，而应该惠及旁人。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安中曾说：“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赠是一种乐趣。”

二、浙东学派思想的影响

浙东学派，从南宋到明清，经过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从叶适到王阳明、到黄宗羲，一脉相承，形成了一整套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伦理。比如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

出的“义利兼顾”的思想；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反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抑制商人的排序及“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的观点；余姚人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经济伦理；到了黄宗羲，更是明确提出了著名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的思想。

可以说宁波由来已久的崇商、重商、善商的传统习俗与社会风气，为浙东实学提供了实践基础；而浙东学派把这种实践上升到理论，冲破了传统的桎梏，提供了新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伦理，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了宁波人的商贸活动。

总而言之，宁波悠久的经商传统和深厚的经济思想是宁波商帮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源头。

（一）农末俱利，工商皆本

浙东学派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倡导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关于经济问题，他们主张通商惠工，反对重农抑商。

明代中叶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确立和完善了其“心学”体系，开创了姚江学派，其思想学说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很大。“致良知”即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所在，简释如下：

致良知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重视商业，同情商人，认为商人“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应当免收或抽收合理商税；还主张建设“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贾往来，渐将贸易”的“富庶之乡”。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皆“有益于生人之道”。“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同样可以成为圣贤，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大弟子王艮聚徒讲学，负贩走卒，听者云集，在宁波一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王阳明及其弟子雕像



黄宗羲画像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明确主张“工商皆本”，对传统的“崇本抑末”命题给予新的诠释，认为工匠制作器物，商贾流通货物，同农业一样“盖皆本也”，只有那些不切于民用的行业才称为末。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影响密不可分。作为浙东学派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对浙东地区经商务实之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守旧者不同，宁波籍学者并不排斥西风东渐。如鄞州人万斯同认为，西法“实可补中国所未及”。他们这些思想不仅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对当地敬贾崇商风尚习俗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潜移默化作用。

（二）经世致用，乡俗崇商

宁波风俗崇商，乡民惯于背井离乡，耻于安守家业。这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作用，相演相嬗，逐渐形成的社会精神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传承性。宁波乡民多谋业于商界，以商为业，以商为荣，民间敬贾崇商习俗源远流长。

乡民不讳言利，奉祀财神。商家店堂设财神龛。新店开张，在财神塑像后背孔内塞进一只活蛤蟆，以牛皮纸封口，久之成为蛤蟆干，以求灵验。古人有刘海戏蟾图，商家视蟾为神物，可招财进宝，可能典出于此。平日对财神也虔诚供奉，每日上供清香、净茶，朔望供素食，端午供米粽，中秋供月饼。学徒进店，要先拜财神。药铺还有一套讲究，年初进货，先购进胖大海、大连子，意为大发大利。学徒进店，先捡万金枝、金银花，意为捡取黄金、银子。也有以药名讨彩头，连翘称和合（状似），红毛大戟称大吉，茺萸称如意，贝母称元宝贝（状似），桔络称福禄，陈皮称头红，橘红称大红袍。

正月初一，店主起床，口念吉词先开门，在门口放炮仗，称开门炮。开门炮一般放三个，要“带四放三”，留一个做“备炮”，宁波话“备炮”出典于此。炮仗放得越高越响，示意新年越吉利。若是“吹、吹、吹”的哑炮，则视为不祥，要马上就说：“哦，吹吹响，今年会发财。”并立即补放一个。

正月初五，为五路财神日。经商人家最重五路财神日。初五那天，商家五更即焚香燃烛，恭迎财神。供品除糕饼果品外，牲礼需全猪全羊。其实是猪头猪尾加一刀猪肉和羊头羊尾加一刀羊肉。还需公鸡、雄鹅、一对黄鱼、一对活鲤。公鸡、雄鹅，意谓“鸡啼鹅叫，商店会发”。宁波人称十两重的金条为大黄鱼，供祭金黄透鲜的大黄鱼，寓“招财进宝，黄金万两”之意。用鲜活雄鲤一对献祭，祭后由两人持至江河放生，是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彩头。接财神时，店主手持三炷香，从屋外踱步摇香至店堂，示意财神已接进店内，而后依序膜拜。焚化纸元宝，火焰冲得高，视为吉利。祭神后吃财神酒，老板宴请阿大经理和职工，为商店盈利出力多者坐上横头，老板执壶为其斟酒。头道菜要上形似元宝的圆蛤，寓进元宝之意。这一天，第一个顾客登门，要奉上内泡两个金柑的元宝茶，以示开笔进元宝。正月，店主相约同行挨家宴请“新年酒”，以时新佳肴待客，加深商谊，洽谈生意。

商家还有许多禁忌。店员在店堂，忌伸懒腰、打呵欠，忌踏坐地袱（门槛），忌手托门

枋，忌背脊朝外，说这样会挡住财神进门，生意就不来了。扫店堂，要往里扫，忌往外扫。数钱币要往里数，忌往外数，说这是“招财进宝”。在用语上也尽讨彩头，猪头称“利市头”，猪舌（与“蚀”谐音）称“赚头”。遇顾客购买结婚用品，失手敲碎东西，忌说“碎”字，而说“先开花，后结籽”。卖布，忌敲尺子。卖酒，忌摇酒瓶。走路跌跤，要马上说“捡了个元宝”。

崇商风气所及，宁波人寒暄问候也不离商。路遇熟人，往往问：“在啥地方发财？”外出经商发迹的，谓之“出山”，反之则谓“旣出山”。民间有歌谣：“囡囡宝，侬要啥人抱？我要阿爸抱，阿爸出门赚元宝！”市井街巷广泛流传着追逐钱财的谚语，如：只要铜钱多，哪怕落油锅；世上无难事，只要现铜钱；只要铜钱多，牌楼抬过河；顶臭是穷，顶香是铜；等等。

浙东学派“工商皆本”思想与当地“操奇计赢，搏什一之利”的经商传统相互交融，使宁波涌现出一批商界俊彦。尤其是在上海、宁波开埠后，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经商之风很盛，即使大学毕业或自欧美留学而归的，也多有谋业于商界的。

第三节 外来文化的影响

从文化学角度看，一地的文化发展状况与该地文化交流程度密切相关。文化交流越频繁，文化发展越快。宁波商帮的快速发展，与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有直接的关联，在吸纳外来文化精华的过程中，自身得到了有益的补充和壮大。

一、渡海经商，外贸频繁

在日本弥生文化后期（相当于中国东汉、三国时期），日本商人即开始驾船泛海来会稽郡贸易（时宁波属会稽郡）。据《三国志》记载，这些商人主要到会稽买布。他们到会稽，往往先驻足宁波，并同宁波商人有贸易往来。

唐时（618—907年），明州（今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839年至907年，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7次，其中有确切记载通过明州放洋的达7次。842年至865年，海商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今镇海）出发，7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0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当时明州不仅有大批日本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新罗（今朝鲜）和大食（今阿拉伯）商人。

北宋时期，明州是全国三大贸易港之一。宋淳化三年（992年），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移到明州定海。咸平二年（999年），在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明州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明州设来远驿，招待外国商人。那时明州是通往南亚、中东、非洲东海岸“陶瓷之道”的起航地，为接待阿拉伯商人，市舶司西设有波斯馆，狮子桥北建有清真寺。开赴日本、高丽（今朝鲜）的商船大都在这里放洋。日本、高丽海舶来华，也聚集在明州。1038年，陈亮等147位明州商人到高丽经商。南宋时，明州又与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罗（今印尼）、大食等国进行贸易往来。斯波义信在《宁波及其腹地》中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宁波沿海有将近8000艘航海帆船、小帆船和渔船。其中，属于鄞县人的有624艘，属定海（即后期镇海）